

## 遺產與發展：關於松山的爭論及其他

蘇一楊\*

最近數幾月以來，針對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展開一場重要的個案爭論。參加這一論爭的不僅僅有本地的社團，還有本地的研究人員以及文化界人士。不僅僅在報刊上面進行討論，同時也有很多評論、意見和看法。這件事情眾人皆知，起源是原來準備在松山腳下起造兩座百米多高的樓宇。這樣便破壞包括炮臺、小教堂和燈塔在內的整個松山文物區的景觀。正如大家所知，上述各處均為歷史建築，而且是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物遺產名錄的建築物。另外類似的問題也在孕育之中。現在有消息傳說，儘管是很不確切的消息，將可能在上帝之母耶穌會教堂（一般被錯誤地稱為聖保羅教堂）之後，起造一座高層塔樓，將完全破壞這一澳門城市地標的景觀。儘管澳門現在已經被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遺產的名單，但是它給這些遺產取了一個直接的名字叫做：澳門歷史建築。當時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sup>1</sup>提出的建議是，應該把這組文物稱為澳門歷史城區。這樣便強調了澳門整個歷史建築結構的相互聯繫及結構作用。目前遵循的正是這一建議，同時大張旗鼓地做了旅遊方面的宣傳，特別強調了這一歷史城區的歷史及文化特性。然而，嚴格來講，不可以稱其為歷史城區，因為它所給人的概念太空泛，因此，沒有任何提高其素質的內容。所採用的仍然是一個陳舊的看法，即葡萄牙殖民研究將澳門比喻做一個西方與東方交流的城市。<sup>2</sup>

---

\* 葡萄牙文化博士（1992年）、歷史副教授資格考試（1999年）。目前擔任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歷史及遺產研究碩士班協調負責人及歷史及遺產研究中心協調負責人（Centre For History and Heritage Studies - CHERISH）。作者感謝他的同事莫拉里斯（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對本文所作的評論、建議及修改。

1.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它擁有多方面的專家，專門從事文物保護並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諮詢。
2. 請見關於這一模式的基本著作，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東方文萃出版社，1990年。

在此，我們不準備就這些本質主義論的看法的科學哲學性進行討論，因為如今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可觀的專門書目，從社會科學、史學及經濟學數個方面對此研究。現在已經逐步消除了總是以東方和東方學為主的歐洲中心論的看法，導致了對此所進行一場漫長的批評革命。這一批評革命以已故巴勒斯坦知識份子和院士賽義德<sup>3</sup>所發表的關於東方學的開山作為源頭。近期，有一些基本的作品，例如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sup>4</sup>。然而，更專門且十分出色的著作是彭慕蘭關於歐洲和中國歷史作用的論文。他闡述了歐洲和中國在現代世界經濟形成當中的作用。<sup>5</sup>此外還有許多著作可資參考。因此，我們不可以輕率地相信世界歷史為歐洲文明所創造的說法。它從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便一直統治著整個世界。地理大發現以1492年哥倫布向安地列斯群島的處女航為起始，還包括1498年達伽馬所率領的船隊通過海路抵達了印度。這種脆弱的歷史概念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一種歐洲至上的觀點，但是到目前為止已經受到了迅速修正<sup>6</sup>，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更科學的共識。其中之一便是：當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於19世紀強加於亞洲經濟和社會時，便形成了一種不間斷的全球經濟關係。<sup>7</sup>

然而不幸的是，這些概念的更新，提出的論題以及所使用的方法現在還未涉及到澳門歷史的主要問題。關於澳門長期存在的結構的主要基礎所做的研究是片段式的。要做的研究很多，可以從經濟指數到整個社會階層的主流。同時，可以看到澳門城物質生活本身基本要素的歷史研究是有限的，而且屬於揣測。我們對於澳門城的交通系統知

- 
3. 賽義德：《東方學——西方概念中的東方》，紐約，Routledge 出版社，1978年。
  4.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8年。
  5. 彭慕蘭：《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普林斯頓-牛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
  6. 主要參考著作可見，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紐約-倫敦，The Guilford Press 出版社，1993年；布勞特：《八位歐洲中心主義歷史學家》，紐約-倫敦，The Guilford Press 出版社，2000年。
  7. 蘇一楊：“世界經濟及全球化形成過程當中的亞洲與歐洲：軌跡及史學討論”，澳門，《文化雜誌》，第9期，2004年。

之甚少，對於資本積累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社會的勞動分工也知道的不多。同時，不知澳門城的能源問題是如何解決的，連人口的結構問題及家庭結構問題都被遺忘掉了。在此，幾乎可以舉出一大串被遺忘的研究課題，有一些基本論著，但是缺乏具有更高科學性的專著。我們所不知道的情況還包括澳門文物的歷史。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文物僅僅為22座建築物，兩個廣場。這便構成了這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歷史城區，但毫無疑問的是，它不是“自然”給於我們的恩賜，更不是“本質主義論”的。僅恰恰相反，澳門的歷史建築正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歷史過程的結果。它包括從權力的戰略到一些更加複雜的與認同有關的專門問題。因此，澳門的歷史文物建築是一項空間和時間的組合，它強調了一個地區長期生存最明顯的外部特徵，它既在殖民的攻勢和殖民的困難中，受制於中國的控制，同時又在社會經濟的作用下，生存下來。它所面臨的處境是危機與發展，或者是移民與文化適從。澳門文物是一個過程的結果。然而，無論好歹，澳門的歷史文物至少表現了一種不對稱的認同，同時，也表達了一個多元“種族”的空間。因此，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對甚麼是最重要的事情具有基本的瞭解：對過程的研究。

## 一、澳門文物建築可以作為多學科研究的領域

這一考慮對關於澳門歷史文化文物的討論來講，是必不可缺的。現在，已經展開了新的討論。這樣我們便來討論一個更加現實，更加看得見摸得到的嚴肅問題，這便是由25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群。它是人類遺產的一部分。近期，在本雜誌上曾經刊登了一篇梁錦文和勞日添撰寫的文章。此文的目的是企圖以簡單量化分析的方法來分析這一小批歷史文物<sup>8</sup>，其結果不言而喻。這兩位作者開始強調說，澳門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是“中國血統的華人”的居民，“但是25座由歷史建築物與廣場所組成的‘澳門歷史城區’，有多達20處為

---

8. 梁錦文、勞日添：“‘申遺’成功後的澳門文化政策反思”，《行政》，第19卷，2006年，第3期，第1055-1072頁。

葡萄牙人400多年以來所興建的西方式建築，只有5處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華南傳統建築。”(第1055頁)如果以嚴格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些在葡萄牙人經商和殖民統治時期內所建築起來的公、私樓宇全部是由華工建造的。當時的勞動分工將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人排除在所有的工業化前生產活動之外。不見他們從事麵包烘製及更繁重的產業勞動。正是中國工人的勞動建立起了這些廟宇和有名的樓宇，使其具有了中國建築文化所有的特點、象徵和影響。對這一過程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這兩位作者超越了某些沒有歷史根據的說法，但大談特談一般來講是錯誤的關於認同和移民複雜問題的分期，再次強調說，列入“世界”遺產的百分之八十“景點，絕大部份(80%)都是西式建築，而中式建築似乎是‘點綴式’的。”(第1058頁)。還配置了幾幅這一狹小的被列入“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的分佈統計圖，強調了這百分之八十“西式”建築同“與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澳門居民比例(95.66%)是成相反的趨勢”(第1060頁)。此種對比一目了然，然而卻給列入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的推廣帶來了問題。

緊接著這兩位研究人員又從“從宗教角度”，分析了這一歷史城區景點的分佈情況。另外一個可以猜到的結果便是，他們對人口提出了新的看法：“可見代表基督宗教的世遺景點遠比廣義的佛教為多，其中光是天主教的景點便佔了40%。”(第1062頁)。另外一個看法是：“在澳門號稱擁有80%信徒的佛教，其在“世遺”之代表景點只有12%，相反的是，在澳門只有5.74%之天主教徒，其代表的“世遺”景點共有44%。”(第1064頁)這種將各種資料分類是一種有限的統計數字方法，不失其詳。儘管提出了某些建議，同時試圖對澳門的文物作些有益的分析，但是這篇文章似乎還值得進行更科學的商榷，尤其是考慮到其觀點在本地學者當中有一定的影響，因為在本地經常將文物作區別，分散和切割。歸根結底，澳門文物正是體現了一種多元性。目前所存在的和企圖保存的建築物。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的結果，反映了權利、統治、貧困、剝削、生存以及發展。

為了進一步以嚴肅的態度來商榷梁錦文和勞日添二人所提出的這一爭議，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文物不是一種學科，更不是笛卡爾式數

學方法的精密科學。即便在社會科學方面而言，量化的方式一般來講，只是用來方便進行對大型資料，尤其是結構性資料的研究，例如價格、資本、投資、人口以及各種各樣的密集型及重複性的資料。在這方面使用量化的方法可以找到結構性及總體的傾向。如果將量化方法適用於文化、心態，甚至文物方面分析的話，那麼這幾乎常常是一種無效的工作，而且具有巨大的欺騙性。如果僅是在數量方面進行比較，例如以所有在19世紀或20世紀中國作家所出版的書籍為例，那麼可以導致輕視、忽視另外一些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真正在政治、社會及文化方面影響了“不太有名作者”的作品。“不太有名作者”並不因此而次等“重要”，因為儘管數量巨大，但讀者不多，不為人所聞罷了。如果對被列入人類文化遺產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物單的25個景點只是做量化方面分析的話，不僅僅是過分強調了一個暫短的系列的代表性，嚴格來講，不能夠代表大眾性的建築物。同時，也可以得出完全荒謬的結論，例如：將基督教新教在澳門歷史上所產生的一個景點——早期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關的小教堂和墓地及像馬禮遜<sup>9</sup>這樣的英國聖公會的牧師僅僅佔全部單子的百分之四。它不僅僅是比重過多了，而且沒有代表任何一種社會歷史過程。在此情況下，只是涉及到歐洲的資本基本上進入了澳門貿易的領域。

如果說梁錦文和勞日添二人的論文的目的是要表明世界文物本身的歷史便是“短暫的”，而且有很明顯的社會及文化代表性的話，那我們在此問題上便有了一個普遍的共識。說實在的，這些文物建築(或能否可以稱作“景點”?)構成了世界文化遺產，很難用“澳門歷史城區”這樣一個短語來表達，因為從歷史角度來講，澳門歷史上從來便有過不同的文明、社會、文化及象徵中心。受歐洲影響的樓宇和空間，尤其是受“葡萄牙”<sup>10</sup>影響的樓宇和空間自然會多於基於中國文化和象徵

9. 馬禮遜(1782-1834)是第一個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他曾經將《聖經》翻譯為漢語。在澳門，他曾經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翻譯並於1818年成立了Colégio Anglo-Chinês，後來稱英華書院。他安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這也是被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單子上的景點之一。

10. Wong Shiu Kuan：《澳門建築中整合的中國及葡萄牙的影響》，香港大學建築系，1968-69年；羅德里格斯：“澳門建築史”，澳門，《文化雜誌》，第34期，（第二系列），1月/3月（1998年）。

的樓宇和空間。而澳門的中國文化與象徵又是與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緊密相連的。同時，還與在南中國海和東南亞海上流通的海上居民有關。對這些空間的研究沒有得到深入。它沒有保存下來，也沒有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遺產被運用起來。對此似乎毫無疑問。實際上，澳門是一個各種政權及社會統治策略之間漫長的平衡及談判所形成的複雜空間。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主要建築是歐洲型的，中間也包含了一些當地和區域的成分。它產生於十分坎坷的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人在此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當時企圖將澳門變為一種殖民地，但是這一做法不總是獲得“成功”，而且沒有得到甚麼當地社會的支持。那些重大的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的經濟戰略及“文明”意識形態正是目前澳門歷史研究所認為是造成至其時中國作為世界性經濟，在世界交換體系中所佔有的主導地位的最後萎縮。

不應忘記的是，在1840至1920年這80年期間，葡萄牙人發動了數次大規模的殖民性質的攻勢，無可挽回地改變了澳門的歷史文物面貌。如果我們看一看天主教所產生的文物建築，現在受到了改變和嚴重的損失。加斯欄修道院消失了，聖人家辣修道院被摧毀了（這是在加諾薩修女進入澳門之前，唯一的一個天主教女修會）。同時，拆毀了風信堂附近的耶穌受難之路小教堂，仁慈堂的教堂也不復存在，摧毀了數以十計的小教堂、十字架、還原品及“小神龕”等等。澳門基督教少數社團在當地人人皆知的部分重要建築物永遠地消失了。這同時也不幸地發生在以中國文化為主的文物建築上。中國關部行台，即著名的Hopo（戶部）也遭摧毀，眾多廟宇消失了，市場也被拆毀了，墳地遭到了破壞，小祠堂消失了，傳統的住宅永遠地倒塌了。更有甚者，傳統的手工業未能抵抗住第一次工業化的浪潮。作為工業化前產業之一的麵包業消失了，挑水夫不見了，賣茶和青菜的流動小販不見了，城市裏許多小販都消失了。當時作為商業廣告的各種海報和小旗也消失了。無論是民間演藝會，還是街頭藝人都消失了。這種殖民和“發展型”的攻勢，如果是在今天的話，一定會引起一片抗議和憤怒……

這80年的歷史教訓使我們認識到目前保存和保護歷史文物的重要性。它只不過是一個剛剛出現的要求。儘管已經在社會上形成了影響，但仍未最後滲透到教育和研究戰略之中。嚴格來講，對於建築文

物的研究只有通過多學科的計劃和活動才能夠獲得成功。應將用來保護和修復文物的科學和技術手段與各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科學研究，從人種學到歷史，從社會學到人類學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夠解釋清楚建築文物所產生的歷史背景、意義和作用。如果從單一學科或技術的角度來探討建築文物問題，一定是不明智的，因為僅僅保存性質的戰略，也就是說，在保護某座古老建築方面下本錢或進一步設立博物館和公共建築物，通常會忘記建築文物所具有的社會性和經濟性，此外還會將公共預算用於開支浩大的此類空間的修復及管理。反過來說，從一種普遍和大眾的態度來說，我認為，那些古老的建築和空間應由現代化的設施所代替，因為它們不需要進行修復或者重新使用，因此在經濟上更合算，從文化角度來講更加有意義。因此，澳門幾個月來面對新舊之間的討論圍繞著一個主題：松山。

## 二、具體的文物建築，松山個案

澳門的文物建築包括澳門所有的歷史及文化建築。因教科文組織將其中25個景點列為世界遺產而舉世聞名。這一爭論的起源是要保護景點之一：松山砲臺、小教堂和燈塔的景觀。這一討論是有益而及時的。這是一個實例，因此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研究個案。通過它，可以探討文物建築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澳門科學研究所面臨的巨大責任。應該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進行文物建築的研究。我們先從松山砲臺的起始日期開始。它建於1622年。在1638年便已經成為了澳門海防的主要設施之一。<sup>11</sup> 同時，在砲臺內建立了聖母小教堂。這是一塊很小的地方，但是充滿了文化氣氛，是為當時的守軍服務的。裏面的牆壁和天花板上有許多17世紀巴羅克風格的壁畫。上面的主要造型是聖母瑪利亞、基督及聖經的內容。<sup>12</sup> 1864年，在這個歷

---

11. 砲臺入口處有一銘文說明，該砲臺係由被稱為澳門公民的人贊助建造。所謂的公民，實際上是泛指構成推選澳門議事亭成員的商業資產階級。建築工程於1638年3月竣工。當時的砲臺司令是諾羅尼亞。

12. 小教堂內的壁畫是由中國工匠繪製的，表現出十分有趣與和諧的《聖經》題材與完全是中國裝飾，例如獅子、白雲及其它中國文化象徵圖案的融合。

史建築物旁邊設立了整個中國沿海最老的燈塔。<sup>13</sup>這一燈塔於1874年為一場猛烈的颱風所摧毀。直到1910年，燈塔才重放光芒，為當地的海運指引航向。這一燈塔可以說是澳門文化的另一個地標。它代表了各種人民、文化及宗教交匯點。

同時，以那高聳的松山燈塔為中心的這一建築群也是澳門數個城市景點的集合點。它形成了一個風景點，形成了松山上面這個建築群。這座山上以前有許多墳墓，但是，無論如何，它具有其特殊性和生態及社會功能。其生態環境很好，因此每天有許多澳門人來此進行體育鍛煉和休閒。現在，建造兩座高度超過松山的樓宇的計劃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但是圍繞著對建築物的保護問題展開了有益的討論，並由此可以發現，這方面的研究、探索、管理及澳門的文化、有組織的娛樂活動是非常薄弱的。包括那些被列入世界遺產的景觀地理位置很分散，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沒有形成一個歷史城區。面對不可避免的城市建築和不動產的投機和買賣，它受到的保護不多。然而重要的是，應該強調對松山整體歷史建築的保護。現在已經引起了民間和文化界人士的真正注意。這表明澳門的文物建築可以，也應該得到普及。毫無疑問，無論其政治、文化及宗教背景如何，無論當時社會與政治主導勢力所採取的保護或者銷毀這些城市記憶的有選擇性政策如何，松山這一建築物群肯定地可以說是一種屬於全社會和城市的歷史文物建築。我們這裏所舉的松山燈塔的例子，如果說沒有打破梁錦文和勞日添二人所進行的數量化研究分析的觀點的話，至少對它進行了挑戰。不是某種“種族性”或宗教認同為澳門文物建築定性。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這些文物建築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權力、經濟發展以及競爭的後果。這一文化遺產現在已經必須與特區的情況相適合。值得慶幸的是，特區現在正處在一個非常好的經濟發展過程之中，它與一個非常迅速的全球化過程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在此，“輸家”或那些“疏忽者”，可能遭到文化遺忘和傳為周邊經濟的滅頂之災。

---

13. 燈塔建造計劃的設計者是澳門土生建築師羅查。



### 三、總體文物建築與城市發展

所謂的關於松山的討論，或許還有其他更多的類似討論將層出不窮，為進一步高質量地、嚴格地研究歷史文物建築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係開闢了機會。這是一種由來已久，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舊與新之間討論的翻版。或許最持久的辯證法在於企圖在文化與經濟之間形成爭鬥，換句話來說，便是“文科”同“理科”的爭奪。幾乎在所有的歷史過程中，在相反的觀點衝突後，會出現一條漫長的總結道路。這一由來已久的想法強調說“德便是道”。應該吸取這一個案的教訓，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文物建築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結構，努力採取七項基本原則。

#### (一) 文物建築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從來不可以成為一種排斥和衝突的關係

目前，文物建築方面的專門科學研究已經引發了許多文物建築與發展之間關係的討論。這在亞洲數個古老的城市中都已經出現過。值得指出的是，文物建築與城市建設之間的聯繫最後總是導致某一灰色地帶的衝突。在此，除了有地產開發的投資之外，還設立大型的商業中心。的確，現在對中心地帶的日益增高的競爭和投機，及小商業逐漸讓位於大型商業中心的這一複雜過程，已經改變了城市的歷史及文化景觀。但是同時也改變了許多古老城市的社會及經濟景觀。值得慶幸的是，亞洲世界最後終於作為經濟全球化決定因素而崛起了。大型的住宅工程，伴隨著巨大的金融、服務業和寫字樓而出現。這些建築通常來講是與強大的國際性公司有關。這一發展的強烈勢頭是由資本的全球化的高度增長所帶來的。而工作和交流實際上是無法避免的，它會最終改變大都市城市規劃的基本結構，將使許多傳統型的區域和建築逐漸消失。這如同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某些傳統的結構抑或那些涉及到勞動及資本的概念的一去不復返一樣。相反，政府所進行的投資及國家所進行的大型城市建設項目，通常來講，政府與城市建築的投資喜歡使用（甚至濫用）有歷史和文物建築價值的空間與樓宇。的確，在許多亞洲大城市中，許多樓宇和政府的部門的設立而恢復了那些已經陳舊不堪的歷史文物建築，因此進一步突出了當地的認同，形成了

新的國家服務及行政結構。因此，在官方對認同因素及某座有名建築的認識和私人資本方面要進一步佔據城市中心，獲得建造不動產和大型超級市場的企圖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在此情況下，提出的基本問題是，要知道如何可以將文物建築保護工作與城市發展結合起來。這不僅僅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對於參與這一經濟遊戲和市場的亞洲大城市來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整個過程難道不是由全球化所擴展的嗎？

## **（二）避免文物建築保護與城市發展衝突的基本戰略不僅僅要求將文物建築保護列入任何一個城市發展計劃的核心圖中**

顯然不可能事後來考慮文化歷史遺產在經濟與城市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換句話說，一旦決定進行發展，具體要做的是通過城市的更新和現代化來獲得這一發展，吸引了投資和資本後，設立新的公司、貿易、服務及就業，因此要對從城市的基本基礎設施到道路系統進行現代化。這樣便沒有空間將文物建築融合到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中，所想的只有一個目的，這便是將歷史文化遺產，充其量作為某個發展過程的准認同象徵性裝飾物。然而，更糟糕的情況是，可能彙集了一些遺跡、殘存，甚至殘牆斷垣，但至少要搞些矯揉造作的裝飾，做清理工作。嚴格來講，只有在十分罕見且不是佔主流的情況下，文化歷史建築才作為一後續計劃被列入經濟發展計劃之中。相反，文物建築需要列入城市發展規劃及計劃早期施行階段之中。不僅僅是為了在某個建築方面來講敏感性很高的地區設計一個新的樓宇，或是設計一個大型的不動產計劃的開發，一旦明確了這種情況，進行了研究，而且已經做出了文物建築總體的規劃之後，必須要對其加以保護，而且要使它作為城市的認同而具有生命力。因此，需要做社會工作。從文化方面來講，將它們作為城市認同回憶的景點加以社會化和普及化更加漫長。因此，需要將文物建築改造成真正的長遠發展計劃及談判中的核心圖。關於這一過程，在澳門的情況下，現在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仍然沒有任何計劃。缺少研究、社會文化方面的對話與和諧，尤其是對文物建築僅僅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中建築物的

一部分，而不是主題、唯一或領頭部分上沒有共識。實際上，如果歷史文物建築可以作為所有城市發展計劃的特殊成分的話，那麼將導致將歷史城市改變成充滿民俗和古董的博物館。這樣會對它所處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空間產生巨大的限制作用，同時，也同大城市本身的生存進行競爭。這些大城市最後被迫與全球化過程的快速節奏相吻合。

### **(三) 在許多城市建築發展迅速的亞洲城市中，距文物建築保護標準最近的是形成一種主流建築“面牆”的概念**

許多亞洲城市都具有共同的被殖民的經驗，從馬尼拉到雅加達，從孟買到河內，因此一個十分共同的解決辦法便是：從政治到經濟。文物建築及歷史建築的保護在於將它們置於千篇一律的專門建築手段處理。經常的情況是，動員了許多，甚至是具有國際聲望的建築學家來對文物建築進行技術保護，但通常情況下，僅僅是對這些歷史建築物的古老面牆進行保護或者更新，或者是採用值得商榷的“模仿”的辦法來依照原樣修復歷史文物建築，或者按照建築物的現有建築形式來進行保護。通常情況下，這些措施都是“技術性”的。儘管很能吸引人且“不難做到”，但它只是一種圍繞原建築物的遊戲。它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即容易又無新的靈感。嚴格來講，這是一個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歐洲文化長期延續的繼續。這一情況，我們可以在仿古式的圖案中看到，同時，在那些新或舊的各種風格中找到。歐洲及“西方”發展社會的這種基本概念與有關的歷史和文物建築概念相聯，因此必須突出希臘或羅馬的基本原則。此種做法與許多亞洲文化城市規劃的特性及歷史文物建築是不相容的。這些亞洲文化習慣於根據某些約定俗成的原則來更新樓宇，使它具有普世多元性和崇尚宗教的風格。

### **(四) 每一代人應該懷著哲學性的信念來實施對城市發展及文物建築保護的觀點**

文物建築的概念不僅僅是不分區別的蓋指一切樓宇和古代文物建築。文物建築同時由我們現在正在建造的樓宇和城市結構所構成。每一代人應該有權將自己的時代特點融入建築中。然而，在通常情況

下，甚至更容易出現的情況是，對於一切新鮮事物都會產生一種負面的社會反映。一座大型樓宇將增加交通噪音，或甚至是影響到人們在景觀方面的權利。一座大型商業建築可能最後破壞了某些地方安寧的日子。開闢一條公路、修建一座橋樑或者架設一座高架橋，對於經濟及城市社會的更新來講，是絕對重要的，但它可能會引起各種強烈的反對。這些影響通常因那些被稱之為質樸“情調”的破壞而進一步加劇。然而。要在社會層面解釋清楚為甚麼喜歡或者不喜歡一個新的建築物是不容易的。在澳門，有多少人可以從數量上談論某一建築的長短？甚至還可以做這樣有趣的推問：今天我們如何反對現在我們已經將其視為文物建築而經常出入的建築物。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以最後這十年澳門城市發展的最大項目澳門觀光塔為例，僅僅因為它不屬於通常我們所說的歷史文物建築，而要加以拆毀嗎？某些事物僅僅因為是新的，尤其是那些當代的建築物便沒有其歷史性功績，或其文物建築價值。嚴格來說，所有現在我們將它們做為文物建築來進進出出的歷史樓宇及建築當年也是新建築物，令往昔許多人士和社會集團驚訝，遭到反對。

### **（五）將文物建築保護作為一種政治武器的做法很難幫助保護歷史、文化文物建築**

還要強調的是，有些團體和人士圍繞著對某地或某一具有歷史文物建築價值的樓宇的保護而展開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反對某一發展計劃。在許多情況下，它們所援舉的原因遠遠偏離文物建築保護的目的，譬如新的建築物阻擋了視線，增加了交通，或者增加了居民的數量。自然，那些倡導城市基本開發計劃的人，藉提高當地社會生活的質量和保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都會找到此種理由。借文物建築保護的名義的反對，實際上其真正的目的是要阻止這一發展過程。更糟糕的是，如果是使用或者濫用文物建築保護的名義僅僅是作為一種政治武器，這對文物建築保護有害無益。對於那些將文物建築保護作為絕對的價值，百分之百的價值而反對一切新建築物的團體和運動來講，嚴格而論，這只能說明對他們所捍衛和保護的文物建築未給於絲毫的重視。的確，不談每座文物建築外觀的相對重要性，包括考古

性、建築性或自然性等，不會對其價值產生正確的評估，更不會說適當地將文物建築視為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

### **(六) 只要本地區經濟發展持續下去的話，文物建築及發展之間關係的討論將繼續在澳門社會進行下去**

澳門文物建築保護運動的歷史不過僅僅30年。它所走過的道路尚很短暫。現在，終於因為被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而得到了最後的承認。我們也許還沒有能夠很好地以高質量和成熟的方式來討論這一問題。這些局限造成了有時僅僅從文物建築或發展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情況恰恰相反，應該提倡一種兩者之間的對話，以協調政治計劃及實踐。首先要做的基本工作是將文物建築作為澳門城市發展對話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的一部分來對待。大家心中要有一個核心，將它作為討論發展問題的基本論據之一。通過它來影響所有的城市發展計劃，包括私人投資家。他們只有將這一核心融合到他們的大型不動產及商業計劃中，才會進一步受益。無論如何，經濟發展帶來了變革、新的解決辦法及風險。問題在於知道如何將文物建築作為發展本身的一部分來看待，使澳門文物建築所具有的特性帶來的不同剩餘增值，進一步促進發展。以前，反對將議事亭前地開闢為步行區的店主和商人最後他們不是因為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徒步經過這裏而利潤倍增嗎？

### **(七) 最後，文物建築與發展之間的對立關係同時也是不可避免的全球或普世認同及地區特殊認同之間關係迅速改變的結果**

全球與地方經濟改變對於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前途，甚至對於圍繞澳門文化遺產所引起的抗議有何意義？各種討論和戰略的趨勢是將全球和地方加以區分，這樣是否可以形成一種新型的文物建築定義？官方對於文物建築的定義可以變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包容，但可將一切對於許多人和本地社會不同群體具有意義的東西包括在內嗎？這是一些簡短卻非常嚴肅的一系列問題。如果我們想讓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活生生的單位，而不僅僅是一系列的面牆和只用來作為某種拍攝旅遊

紀念照片的場景的話，應該對其進行研究，應該由整個澳門社會對其進行思考。因此，明顯的是，官方及社會對澳門文物建築的注意力的基本原動力在於發展旅遊。然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過程。旅遊現在已經成為目前全球化的重點之一。它的逐漸專業化是歷史區域和城市存在的條件。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大量遊客來訪及由此而產生的經濟騰飛的話，如何對澳門的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然而，正是在這些方面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澳門去年所接待的兩千多萬遊客大部分沖賭場而來。有些有時間享受一下城市風光的人僅僅局限於在聖母教堂面牆臺階前面匆匆忙忙拍一張照片，留下記念。許多被列為世界文物建築的景點交通不便。不僅僅缺少指示牌，它們的介紹材料也十分缺乏。唯一不缺乏的是已經十分擁擠的公共場合的交通問題。缺少歷史文物建築景點有組織文化活動的設施。現在還沒有對這些景點進行研究的嚴肅計劃。在尚有需要獲得援助和資助的困難下，許多鍥而不捨的專家和具有眼光的年輕研究者紛紛離去，在其他的經濟發展區域尋找對他們所進行的繁重科研工作未予以的承認。